

博览之窗

毛泽东：“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密切联系实际，是毛泽东读书时的一大特点，也是他坚持终身的一条读书方法。

读《二十四史》时也是这样，毛泽东总是能够密切联系革命斗争实际，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比如，他在读《南史》卷58《韦睿传》时，写下一条批注：“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韦睿作战能攻善守，英勇果断，是难得的将才。毛泽东对韦睿的品德、作风大加赞赏。

《韦睿传》记载：韦睿“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赐禄，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毛泽东在此段文字旁逐字加了旁圈，写下“仁者必有勇”的赞语。又载：韦睿攻打合肥时，“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毛泽东逐字旁圈，又写了“不贪财”的批语。

李延寿记叙韦睿“雅有旷野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必不先食”。毛泽东逐字旁圈，对韦睿统兵打仗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关心将士生活的优良作风，很为赞赏，欣然提笔写下了“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的批注。

从读史中联想到干部的作风，注重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这是毛泽东联系实际读《二十四史》的一个独到

之处。

（雅志摘自《党的文献》2023年第3期，徐中远文）

新中国成立后几次军事战略调整

国家利益是制定军事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军事战略则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必要手段和重要保障，因此，制定和调整军事战略应以国家利益发展为牵引，这样才能保证军事战略的正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进行了几次军事战略的调整。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新中国成立后，整个国家已由战争环境进入和平环境。此时，军事战略适应国家利益发展所需，把任务重心转换到抵御侵略、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保卫人民和平劳动成果上来。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后期。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和国际战略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我军处于“四面受敌”的不利局势之中。因此，“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军事战略得以确立。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际战略形势发生了一系列转折性变化。尽管战争的危險依然存在，但制止和推迟战争的发生是有可能的。从维护国家长远发展利益的角度出发，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这一时期，我军为支持国家经济

建设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始终是以国家利益为牵引，为国家的整体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世界新军事变革和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使我国安全环境和军事斗争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新的国家安全观赋予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以新的内容。这一时期不仅我军确立的“打赢未来战争、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体现，而且我军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更是维护国家利益取得的新成就。

（瞻月摘自《经济研究导刊》2021年第13期，李太宇文）

毛泽东积极部署对东北抗联的支援与配合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会议还研究了主力红军与东北抗联互相配合的问题。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同朱德一起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以27军、28军、32军及骑兵团共3000余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去，活动于热、察、冀间，而多派红大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运动。”这是全国性抗战爆发后，毛泽东首次提出对东北抗联的援助问题。此后，毛泽东越来越把东北战场作为全国总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关注。1937年8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奋斗》的宣传鼓动提纲中，把“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作为